

通过多极化走向社会主义之宣言

国际宣言小组

2021年9月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统治阶级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生存，就已经“不再适合做统治阶级”，而只是“将他们的生存条件强加于社会”，早在1848年二人就敦促革命者扼杀已经在欧洲摇篮里的资本主义。1848年革命之后不久，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爆发，共产主义的幽灵笼罩在资产阶级头上，尽管有资产阶级的疯狂反对，全世界的革命活动仍然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民主化。

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核心，劳动人民的斗争赢得了福利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受到了监管，在其周边，出现了民族独立和发展型国家。与此同时，从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一些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越来越多地根据需要组织生产，公平分配工作及其报酬，并本着合作精神相互关联。尽管不完全成功，遭遇了巨大的问题和惊人的挫折，他们开启的为超越资本主义、异化、帝国主义和其他社会不公正的斗争仍在继续。

今天，经过数十年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无论在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新自由主义或剩余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在赋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以可怕的意义。在过去四十年的资本主义政策中，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生产活力，转向了非生产性掠夺，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大规模贫困、令人震惊的不平等、日益恶化的社会分裂、严酷的政治迫害、日益严重的灭绝性核战争威胁、大规模人口流动、气候变暖、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生态紧急情况，使我们的星球越来越无法居住。更重要的是，今天它正在应对一场肆虐的疫

情，为了资本和利润牺牲生命，增加政治迫害。众所周知，罗莎·卢森堡担心社会主义的替代可能是野蛮主义。然而，今天的问题是人类和行星的灭绝。

到了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燃烧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频繁地爆发出来。

这个十年始于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欧洲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活动，结束于中小学生对气候变化、印度穆斯林妇女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黑命也是命、法国的黄背心、从土耳其到智利到尼日利亚的反对经济绝望和政治迫害的抗议。到 2020 年，印度政府试图将农业企业化，农民对政府发起了围攻，工人们组织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

随着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混乱地应对这场疫情，事态急剧恶化。无论他们否认这一点，还是错误地将生命与生计（资本家阶级对利润的委婉说法）对立起来，他们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无异于对数百万人的社会谋杀，并引发了历史性的经济危机。

到 2021 年中期，公民要求调查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些残忍反应，数百万巴西街头民众指责他们的政府进行种族灭绝，印度人也在准备同样的抗议行为。对资本主义的广泛不满情绪也随之上升：智利人民选举了一名土著马普切族妇女领导他们来之不易的制宪议会；玻利维亚人看穿了政变企图；巴勒斯坦人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决心，反对以色列的又一次攻击。

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政治火药桶：资本主义的适用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权利集团正在失去控制，主流媒体的信誉也已耗尽。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疫情的反应堪称典范：中国、越南甚至被封锁的古巴，死亡人数相对较少，甚至还帮助了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至少中国的经济恢复了快速增长。

事实上，在 2021 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代表劳动人民在经济、技术、生态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尽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的成就也很高。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最伟大的政治和工业革命、彻底消除封建主义、结束极端贫困、为解决生态紧急状况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在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和核聚变方面——中国现在又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和这一领域内的国际领导力提供了证明。

难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 2021 年 7 月庆祝了自豪的百年诞辰。党使中国成为人类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国家，为根据本国国情追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提供了援助和启示。

然而，今天，这场斗争正处在危机关头。长期酝酿的危机被疫情激化，与中国多方面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领导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仆从国家对中国发动新的冷战。与过去的冷战一样，这场冷战也是帝国主义对从巴勒斯坦到秘鲁、从越南到委内瑞拉的各国人民自治发展的全面进攻。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库，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的控制武器，支持着他们采取的各种手段。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破坏力集中在这么少的不负责任和铤而走险的人手中，用来对付世界上对社会主义抱有客观兴趣的绝大多数人民和民族。

我们的宣言出现在这一危机时刻，它源自于各大洲代表许多社会主义传统的积极分子所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它对当前形势的历史和理论评价，是为了推进阶级和民族的社会主义斗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地缘经济

资本主义与革命密不可分。资产阶级革命不得不把它引入历史，而革命从一开始就威胁着它，从 1917 年开始，人民革命已经开始把它带出历史。因为，与自由主义的神话相反，资本主义是人类能够发现的最不自然的社会生产形式，因为它建立在“将自由劳动与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与作为（我们的）自然作坊的土壤分离”以及与其他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之上。

这个简单的事实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理解，因为许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那样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剥削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并受到二者的抵抗，国家和阶级则是在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形势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此外，每一个遭遇过资本主义的平等主义社会都反对它，今天，那些幸存下来的原住民继续以古老的权利、土地、环境和社会的名义反抗它。

在政治组织日益严密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劳动力、土地和社会，迫使资本家在福利方面做出让步，并接受监管限制和对其征税。

在国际上，在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各个强国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徒劳地寻求维持其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并常常在它们自己之间展开竞争。抵制者企图通过自我保护和国家指导发展生产力，维护经济主权。这

种反抗，而不是世界市场或帝国主义的延伸，在世界各地扩展了生产能力。通过经济发展挑战帝国主义的成功是最大和最为持久的，因为成功的人民革命将私人资本从政治权力中移除出去。这些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的结果是多极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乌戈·查韦斯所说的多极化，它指的是权力的多极化以及各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

早期的多极化导致英国与其新老对手——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不仅在市场方面，而且在殖民地和“经济领土”方面，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仍然可以占领弱国和无国籍领土。

这种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长达三十年（1914-45年）的真正危机中达到顶峰，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和民族斗争最终以击败法西斯主义、两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对西方的殖民起义而告终。这些危机的轮廓值得追溯。

帝国主义的危机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俄国的革命开启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漫长征程。它发生在资本主义发源地之外，必须实现社会正义，发展生产力，抵御帝国主义的持续敌意。事实上，俄国革命和新生的中国革命是世界范围内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的两个风暴眼，它们决定了欧洲和亚洲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胜败，分别付出了大约 3000 万和 2000 万人的生命代价。

中国被公认为主要的反法西斯盟友之一，在 1943 年结束了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并在 1945 年成为独立国家、联合国五个创始国之一。四年后，毛泽东

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战败后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尽管美国的阻挠使中国从那时起一直排除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之外，直到 1971 年。

在帝国主义危机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实现了独立，一直支持它们的只有苏联和后来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立场是两面派的。为了保持西方的统治地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来恐吓苏联。因为渴望在经济上利用前欧洲殖民地，它为这些国家的独立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在 1945 年之后，它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了 50 次战争。然而，事实证明，其昂贵的军械库无法与为独立而战的英雄人民的政治决心相提并论，例如得到中国志愿军援助的朝鲜人民或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今天，美国的军事失败遍布伊拉克、叙利亚，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富汗。

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了自主和平等的国家发展和工业化，以打破帝国主义的枷锁，这些国家受到现在无数的社会主义的启发和帮助，这些社会主义也不得不从低水平开始发展他们的生产体系。虽然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本世纪头十年的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较为人熟知的成功国家，但其它国家事实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倒退，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束，只是社会主义开端的结束。通往社会主义和最终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走上这条道路的社会并不能奇迹般地摆脱阶级和历史的矛盾，挫折是可能的。毕竟，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贫穷国家发生了。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不仅比靠帝国主义的利益过活难得多，而且必须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完成。承担这项任务的政治领导人也可能染上官僚主义，与人民失去联系。斯大林的集体化或者毛泽东的大跃进包含了这些困难的组合。

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的故事让我们想起恩格斯的话，社会主义不是‘永远具体化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和改造的过程’，马克思这样评论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 .. 不断地自我批评，不断地打断自己，... .. 回到似乎已经完成的地方，以便重新开始；他们以残酷的彻底性嘲笑他们最初尝试的折衷办法、弱点和微不足道的东西，似乎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对手能够从地球上汲取新的力量，在他们面前再次崛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不断地从他们自己目标的无限繁荣中退缩——直到形成一种无法回头的局面。

我们务必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保护苏联的遗产，以及所有迄今为止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公正地评价它们的历史成就、局限和失败。毕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尝试也挽救了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危机

根据马克思的见解，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早期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它通过社会化生产完成了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尽管其方式残酷而混乱。早期的竞争资本主义使公司之间的劳动社会化，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加深了内部的技术分工。此后，资本主义不再具有任何充满活力的竞争优势，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垄断的腐朽和食利主义恶习，改变资源的生产用途，抑制竞争。

这些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使世界陷入了“三十年”危机。1945年之后，只有借助社会福利、公有制和规划，资本主义经济才得以稳定下来，甚至享受长达 30

年的“黄金时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靠的则是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政策工具，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增长，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消费（弥补了殖民地市场的损失），并资助了推动生产力增长的研究和发展。美国被迫容忍甚至帮助竞争对手依靠中央集权控制经济所实现的复苏奇迹，因为它们可以防止西方工人阶级和东方农民接受共产主义。

它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共产主义领导的国家享有强劲而令人羡慕的持续增长，并得到了技术创新的加强。苏联在 1949 年制造了具有威慑力的核武器，在 1957 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并在 1961 年将尤里·加加林送入环绕地球的太空轨道，迫使美国处于嫉妒陷入人类登月这一虚荣行为之中。

难怪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转向共产主义，而它们在自主国家发展方面最坚定的努力也更倾向于苏联或中国模式，而不是西方的发展建议。他们的成功，即便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高，也是相当可观的。

战后世界果断地向左倾斜，国际秩序也是如此。尽管美国试图效仿 19 世纪英国式的世界主导地位，但多极化已经走得太远。尽管美国在冷战时期趾高气扬，但它仍受到资本主义对手国家的制约，这些国家追求国家主导的联合发展，社会主义的扩散和稳定，第三世界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治理体制强调各国的平等和主权以互不侵犯。美国成功地将美元强加于世界，但只是通过承诺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事实将证明，美国无法承受这一负担。它成功地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却被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sation）所震慑。控

制资本、计划、经济和贸易管理以及旨在实现充分就业和发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普遍的常态，这些措施将资本限制在国家的笼子里。

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安排中的利害关系最大，它们建立了强大的国际机构和运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加中国，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来利用这些措施促进发展、自治和南南合作。1954年，周恩来和尼赫鲁一致同意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使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遭受了挫折。

虽然有一些左翼的倒退，尤其是中苏交恶，但大多数人预计世界的左倾倾向将继续进入社会主义。

然而，资本仍然控制着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尽管在国家的支持下，资本扩大了生产能力，尽管工人阶级消费的增加以及社会主义和进一步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需求，但生产不可避免地超过了需求。尽管政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生产率增长也达到了顶峰，但由于组织严密的西方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更高的工资和产品价格，他们挤压了帝国主义资本的利润。随着投资和增长放缓，帝国主义经济陷入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经济衰退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一同到来。

新自由主义：衰老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

资本主义经济体现在面临着—个选择：深化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公有制和公共事业，向仍在增长的第三世界投资，以扩大需求；或者像新自由主义银行在资本推动下所建议的那样，取消战后对国内资本的限制，并推动在国外取消这些限制。前者偏爱劳动人民和第三世界，后者则偏爱资本及其买办走狗。

资本赢了。左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很软弱，他们在历史上先后因改革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后接连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处处潜伏的冷战镇压、福利国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等等因素而出现过分裂。绝大多数人——工人、妇女、民族主义运动——从第一种选择中获得一切，从第二种选择中失去一切，但左派无法让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有意义的政治选择。第三世界也不能。尽管在阿富汗、南也门、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等地取得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和革命的进展，但发展和革命进程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巨大压力，以及苏联国内逐渐展现的反革命背叛。

新自由主义的到来伴随着对劳动人民及其历史性成就的攻击，以及巨大的利率冲击，后者使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失去的几十年”的发展。劳动人民的苦难蔓延到前苏联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尽管新自由主义取得了统治地位，它还是失败了。即使在帝国主义经济体中，它也不能恢复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它必然失败。在思想上它是虚伪的。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它试图通过歌颂经济自由、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竞争来捍卫资本的特权，反对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后来又反对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自主发展。通过半个多世纪后支持新自由主义复兴，新自由主义资本梦想的不过是1914年前的威权和帝国资本主义。

然而，历史的时钟永远不会倒转，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并不平衡——它在已经更加自由的英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走得最远——并且每一步都面临着公众的反对。

在国内，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国家所有权、监管和社会保障。它攻击工会，使工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福利减少，福利国家缩水，雇主权力和增强，社会服务减少。

在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专横的法警。他们忽视债权人的责任，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偿还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出口的增加，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少数初级商品和低技术含量的工业产品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出口收入和收入下降。通过要求缩小国家规模，他们还阻止了第三世界国家由国家主导的联合发展，而这些国家需要更高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并且更容易偿还债务。与此同时，在太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帝国资本享有更多的资源、商品和劳动力，压制了主权、人民民主和国家发展。

然而，垂死的资本主义只能滥用其政治优势。它无法扭转经济增长、生产率增长和投资等方面的下滑趋势。它吝啬地拒绝支付体面的税收、工资或供应价格，加剧了需求状况和不平等，将制造业外包到工资较低的地区也是如此。

更糟糕的是，资本，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不是投资于生产，而是越来越沉溺于非生产性的、掠夺性的和投机性的金融活动。美国为此提供了便利。在1971年美元被迫脱离黄金之后，美元系统性地鼓励以美元计价的金融活动，因此美元的需求和价值仍然居高不下。不断上升的债务和资产泡沫吸走了劳动人民、小企业家、政府和纳税人的资金，同时，随着政府越来越频繁的以偏袒债权人的方式解决金融危机，极少数精英的财富不断膨胀。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在这一切中扮演了最具讽刺意味的角色。苏联时代的试验性控制论已经证明了 ICT 在具有民主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规划方面的潜力。新自由主义资本家在控制生产的同时，利用它来进行离岸生产，帮助资本的集中，放纵掠夺和金融投机，占用土地和资源，增加对雇员的控制和操纵顾客，绕开而不是解决需求问题，在无数实际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状况下扩散虚假需求。这种资本主义削弱了人类的福祉、工作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社会服务。

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导致了生态紧急状态：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对养殖动物难以言喻的残酷对待，因为资本把地球免费提供给人类的一切变成掠夺和利润。事实上，由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加速侵蚀和破坏，目前的疫情可能只是最新的传染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病毒。

尽管科学界已达成明确共识，指出国家和国际行动的必要性，但资本主义对利润和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的坚持让事情变得更糟。

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在增长方面的表现每十年恶化一次，2008 年以后，增长速度比大萧条时期还要慢。到 2010 年代末，随着抗议和社会动荡激增，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预计，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将出现一场被掏空的重大经济危机，尤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新自由主义的领导者为最。结果，疫情引发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暴露并加剧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令人震惊的巨大反常。

经济复苏和应对生态紧急状态和流行病需要规模能与社会主义媲美的工业政策、国家投资、社会再分配、环境规划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并需要结束资本家对国家和政策的控制。

通往它的道路是敞开的。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普遍不满是广泛而深刻的，那些在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被边缘化的人群尤为如此。

左派的让位和民粹主义

然而，劳动人民的重要政党和工会，除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例外，大多未能调动这种不满情绪。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工会受到欧洲工会联盟(ETUC)和国际工会联盟(ITUC)的消极影响，历来选择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超国家机构进行阶级合作。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这样的工会普遍萎缩，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然而，激进的基层工会正在激增，继承了反法西斯和反殖民斗争的世界工会联盟(WFTU)仍然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联合了 135 个国家的 1.2 亿工人。

劳动人民的重要党派遭遇了更糟糕的情况。上世纪 70 年代，当右翼政党进一步向右转向新自由主义时，许多这样的政党追随他们，放弃了与劳动人民的联系，尽管往往是在激烈斗争之后。这一现象在西欧和东欧最为明显，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可以看到。

这些政党中受过教育的或知识分子成分起着领导作用，他们通常把大的工人阶级和小的知识分子团体结合起来。然而，近几十年来，后者在托尼·布莱尔和克林顿夫妇等政治家的领导下，在人数上不断增长，已经主导了他们曾经服务过的政党，并引导他们走向新自由主义，其借口通常是“全球化”。

扩大战后的公共和企业官僚机构需要各种具有资格证书的人员和扩大了的专业管理阶层。在新自由主义下，西方国家的生产离岸集中管理、工程、设计、法律、营销、广告、金融和其他职能进一步扩大了这些群体。这一职业管理层，高

于大多数劳动人民，享有许多特权，包括获得私人或公共资源。新自由主义政治机构——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都来自这一阶层。随着专业和家庭联系跨越党派界限，反映新自由主义政策共识的跨党派政治机构出现了，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困惑的景象：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为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提供资金，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起草欧盟（EU）政党融资法规，政党和基金会依赖欧盟和国家资金，不可避免地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

党派之间的分歧现在越来越仅仅是关于政党如何动员他们的选民。虽然右翼政党自然会吸引小资产阶级社会保守主义，但是如今由专业人士主导的主要工人阶级政党把支持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的也只是个人的斗争，通常是边缘化社会群体的特权成员——女性、“显眼的”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少数民族。虽然社会自由主义提出的文化战争占据了报纸头条，但它忽略了这些群体中的大部分工人阶级成员，他们不成比例地贫困、失业和就业不稳定，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善，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甚至更糟。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如此突然地失去了支持。

这个职业阶层更喜欢集会、研讨会、论坛、媒体辩论和竞选活动，而不是工人阶级社区和工厂里群众政治组织的艰苦工作。与此同时，忍受着自己生产的产品价格低廉、失业、异化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人民仍然在追求能够保障其集体权利的社会主义。然而，他们在收入、技能、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路线上分裂，被客观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权力集团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文化战争以及二者对真正激进的领导人和运动的共同政治迫害搞得手足无措。

无论左右，只要有人试图动员对新自由主义不满的大众，这一体制都会将其描绘成“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或博尔索纳罗或莫迪的极右翼政治，科尔宾或马杜罗的左翼政治，都被指责为聚焦社会分裂。然而，前者操纵着新自由主义为获得权力而制造的社会分裂，而后者则试图通过逆转新自由主义来治愈这些分裂。更糟糕的是，这一体制的不偏不倚是虚幻的：他们可以容忍特朗普掌权，但真正的进步派政治人物在接近掌握政权之前必须被阻止，或者在掌权过程中里不断受到纠缠。

人民的共同问题甚至没有得到讨论，更不用说解决了。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后共产主义国家或去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大多数人仍然反对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政治权势集团拒绝哪怕是最温和的让步，这种反对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政治表达。

随着经济衰退限制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发展道路，不稳定的无产者开始包括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更年长些的经理人。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一样，许多曾经属于中间派的“中产阶级”如今受到极右思想的诱惑，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反抗新自由主义、表达了劳动人民的顽强的自发运动，例如法国的黄背心，但最终却沦为反动。1991年后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共产党领导人的背叛——这些领导人更喜欢通过党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来获得职业晋升——加剧了问题。虚构的“团结”——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社群主义——煽动他们反对同一体制的其他受害者，以防止他们认出那些真正应该为他们的不幸负责的人。

因此，本该由左派发动的阶级斗争如今在左派内部激烈地进行着。

然而，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新自由主义权力集团失去了对政治的控制，特别是在国际层面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衰败及其代价。

新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衰落

新自由主义最初攻击劳动人民、第三世界，最终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但它无法维持这种震慑和畏惧。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新自由主义不得不从最初的撒切尔-里根（Thatcher-Reagan）模式转变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化”、21 世纪头十年的美利坚“帝国”和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紧缩”。

当西方国家在苏联的坟墓上起舞时，美国国务院的内部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不能再往前走了。震惊的世界期待着单极世界，期待着和平红利。然而历史本身有着其他想法。

单极性？

历史并未终于单极性，而是加速向多极性发展。随着新自由主义将西方国家锁定在不断放缓的增长之中，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转向快速增长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向那些脱离了最糟糕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俄罗斯。

到 2010 年，这些国家要求改革国际治理体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西方拒绝合作的时候，他们，尤其是中国，启动了新的合作，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新开发银行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中国和俄罗斯还领导了欧亚一体化，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今天世界上三分

之二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它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恢复的军事实力来满足邻国的经济和安全需要。由此产生的欧亚极，覆盖了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和超过一半的领土，至少在反帝方面克服了中苏交恶的破坏性后果。

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坚决反对西方。拉丁美洲左翼政府的“粉红潮”拒绝消失，尽管美国竭力破坏它。在非洲，尽管遭遇了利比亚等国的挫折，但民族主义和左翼势力正在重整旗鼓。前法属非洲殖民地掀起了大规模运动，反对具有新殖民性质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法国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非共和国的占领遭到反对，它在俄罗斯和卢旺达部队的保护下组织了选举。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反对英国领导的津巴布韦政权更迭，而一些邻国正在帮助莫桑比克打击该国北部受伊斯兰国影响的叛乱活动。

今天，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独立，并且正在复兴泛非主义和泛拉丁美洲主义，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男女为之奋斗，表明他们的革命种子仍然在发芽。

和平红利？

和平红利也没有实现。美国试图通过军事侵略来弥补其日益变弱的经济中心地位。战争激增，在人权、民主和保护失败国家公民的责任等口号的装饰下各种战争混合交错。他们推行的不是民主，而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让贫穷国家允许帝国资本的过度开采，甚至包括奴隶制，同时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和发展权。他们还通过封锁药品、石油和食品对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门等拒绝服从的国家进行惩罚。

这些战争也被证明是无休止的。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主要的武器工业生产基地,对这些国家而言,战争是工业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破坏却不能重建,发起战争不光是为了打赢战争,也是为了检验和展示武器,在以色列等军事国家的帮助下,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胜利,留下的只有毁灭的痕迹。

日益严重的军国主义、压迫、贫困和环境破坏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他们受到边境管制的进一步镇压并驱赶给邻国。柏林墙可能已经倒塌,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数百座新墙,言论自由、说出真相的自由、预警的自由和抗议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明尼阿波利斯或巴黎等西方城市,侵犯人权的行为变得司空见惯。

没有和平与发展、社会正义和社会权利,怎么会有人权?如果没有主权,不承认世界多极化、不是尊重而是污蔑中国、古巴或尼加拉瓜等寻求实现这些最基本人权的国家,国家和人民如何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资本主义打着反共宣传的旗帜犯下了反人类和反社会的罪行,它试图阻止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将更好地保护人权——言论、宗教或结社自由,以及过上体面、充实、健康和丰富的生活的权利。

当疫情到来时,这是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的危险状态。

疫情压力考验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尽管有预先的警告,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毫无准备,并在一开始否认其严重性。无论穷国富国,都受到了这场流行病的严重打击。社会和卫生基础设施已经由于几十年的资金不足而严重削弱,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已经不堪重负,在许多贫穷国家则已经崩溃。未得到满足的卫生保健需求,不管是不是因为新冠病毒,都呈螺

旋上升趋势。资本主义政府声称在拯救生命和维持生计之间左右为难，而实际上他们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正在危及人民。

在美国，政府当局优先支持陷入困境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规模空前、措施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一些新自由主义政府甚至不顾死亡人数，试图通过感染达到“群体免疫”。公众的强烈抗议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但却无法阻止仅仅是稍微不那么危险的“缓解”策略：尽可能有节制地使用会降低利润的封锁措施，保持住院率足够低，从而避免使薄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崩溃。

新自由主义政府长期致力于公司控制医药和商品化医药，拒绝加强卫生系统或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和医疗保健能力，以便实现抑制病毒所必需的检测、追踪和隔离感染者及其接触者。相反，政客们以提供医疗和公共服务的名义，为他们的资本家朋友提供私人牟取暴利的机会。与此同时，犹豫不决地实施封锁不可避免地导致封锁的长和反复，使得经济直线下滑，陷入严重的负面境地，并危及数十亿人的真正生计。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犹豫不决的封锁和过早放松的混乱循环也让足够多的“必要的”工作人员受到感染，而政府毫无诚意的沟通也让足够多的人抵制聚集限制和疫苗接种，从而出现了世界上最高的确诊和死亡率。

虽然富裕国家能够提供资金转移（以满足需求而不是支持人民），但在大多数已经负债的穷国，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更加无力应对这一流行病或满足基本需求。

已经很深的社会分歧进一步加深。高收入者在家工作，他们拿着全额工资，减少开支，甚至还清了债务。随着对金融市场的支持使他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牛市，富有的精英们变得更加富有，亿万富翁的人数也更多了。

相比之下，劳动人民，特别是就业状况不稳定的妇女、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要么遭受贫穷、失业、孤立、储蓄丧失、掠夺性债务和彻底绝望，要么是低收入的“必要的”和“一线”工人，继续工作，此外还面临感染、疾病和死亡的风险。难以获得医疗保健、过度拥挤、多人居住的低于标准的住房和无家可归增加了感染、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由于许多工会代表这些工人的力度不够，或者根本没有，而且机会主义的雇主未能保护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

妇女作为受男性控制的生育者、儿童、病人和老年人的无偿照料的主要提供者以及低收入者，因疫情和封锁而遭受到更大的倒退。由于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需要照顾孩子，导致数百万妇女放弃就业，单亲家庭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随着医疗体系的崩溃，数百万妇女失去了避孕的机会，而且在封闭期间家庭暴力大量增加。

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很脆弱。由于政府的虚假信息和右翼的嫁祸，各个少数族裔——如北美的东亚人，印度的穆斯林——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和仇恨言论。在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对性别少数群体的歧视加剧，也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

最后，孤立和缺乏社会参与，扰乱了教育和考试，所有这些都特别打击了年轻人。那些没有可靠的计算机、互联网和电力的人受到的影响更大，许多人可能

完全辍学。令人沮丧的就业机会和永不就业的可能性进一步加深了青年人的绝望感。

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惊人的对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卫生基础设施，由一个能够优先拯救生命的政党执政——在几天内建起设备齐全的医院，或者动员全国各地的医疗工作者赶往武汉——中国抑制了病毒，挽救了生命，如今经济再次引领全球增长。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截至 2021 年 8 月 6 日，中国的死亡率为每百万人 3.22，越南、老挝（世界上受轰炸最多的国家）、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率分别为每百万人 27.94、0.96、281.11、128.92 和 29.59。相比之下，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1858.96 人、1920.72 人、704.81 人和 1661.87 人，尽管传统上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和儒家思想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分别为 120.61 人和 41.21 人。

资本主义国家竭尽全力不承认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功。甚至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也在证明抑制优于缓解的时候选择了把研究范围仅限于经合组织国家，排除了模范的社会主义抑制模式。

新自由主义政府不愿意将公共资金投入技术和人力上以抑制病毒，而是急于增加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他们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疫苗上。然而，疫苗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足以应对疫情。一个适当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检测、追踪和得到充分支持的隔离制度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由于信任受到侵蚀而导致人们对疫

苗接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即使在富裕国家，疫苗接种也远远低于人口免疫所需的水平，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得不到保护，导致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和扩散。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疫苗种族隔离将确保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和扩散。富裕国家坚持尊重大型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买断短缺疫苗的供应并保持这一短缺，同时阻止许多国家生产这些产品。当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合理的价格和捐赠来增加世界疫苗供应时，西方嘲笑这是“疫苗外交”，并阻止贫穷国家接受疫苗。

随着新的病毒变异的出现，新的疫苗或剂量的增加将给大型制药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它们也将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地方或全国性的封锁和放松的循环，所有这些都将对劳动人民的生计本身产生重大影响，更不用说更深的不确定性、不平等、绝望和死亡。

当经济复苏到来时，肯定会是微弱的、k型的分化式复苏，少数富有的甚至更加难以置信的精英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将进一步加深。

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和民族斗争

社会主义的成功与资本主义的失败之间的鲜明对比，将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国际力量的平衡相关联。在不久的将来，向社会主义迈进将不仅涉及国内阶级斗争也将涉及国际斗争。

作为回应，帝国主义资本家试图开创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一个伪慈善阶段。它的主导话语将声称为人们提供关键要素，无论是疫苗、绿色或医疗技术，还是教育和医疗服务。当然，随着全球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抑制需求，国家将成为首选客户。关于公民有“权利”要求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话语将会激增。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和增加政府支出的必要性也会增加。私营企业为了盈利而生产这些

“必需品”的合法性将被私营部门“创新”论、“选择”论和“效率”论所证明，税收收入将支付实际上低效和专制的私人生产的劣质和不充分的商品和服务，金融投机和食利者活动将继续有增无减。

当然，由于社会分化的加深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衰落，这种新自由主义无疑将面临阻力。即使缺少有组织和精明的左翼反对派，其在不断曝光的欺诈和腐败行为中的明显失败也将引起政治震动。在国际上，随着更负责任的政府转向其它贸易和投资关系，譬如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这些做法和言论在资本主义帝国核心之外的国家中只会取得有限的成功。

事实上，随着多极化进程的推进、帝国主义和美元主导地位的下降以及资本主义继续运转不灵，新冷战时期针对中国的宣传将听起来越来越空洞。更糟糕的是，帝国阵营内部——北约内部、国家之间、甚至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歧只会越来越大，这要归功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吸引力，即便对于西方、其传统盟友和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美国试图把欧洲、东亚和南亚以及澳大利亚的“民主”盟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印度-太平洋四边形”战略，但这一努力已经停滞不前。

基于美国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日益暴露出其本质：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制裁、禁运和战争否认第三世界发展的权利。中国支持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联合国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陷入了僵局，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和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地前进。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政府和运动，例如伊朗或也门的安萨鲁拉

(Ansarullah) ，乍看之下，对劳动人民及其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而言，可能会显得陌生。然而，他们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封锁、经济和金融制裁、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的影响，因此至少应该得到反帝国主义的团结。

当代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具有历史进步性。人类面临的任务是：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之际，从资本主义手中夺回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社会化生产。这场工业革命涉及机器人、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物联网、3D 打印等等。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中国正在引领潮流，越来越多地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在这些技术的标准、知识产权和相关租金方面的自主权，并挑战美国作为安防国家在网络方面的最高权威。

今天，一些国家的人民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大多数人还在为维持衰退的和过于昂贵的资本控制付出代价。现在正是所有劳动人民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通过形成一个自我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

当然，我们在漫长道路的尽头将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并通过“各尽所能”和“按需分配”来分配社会产品的社会。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经历社会主义的几个阶段——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和世界观，然后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化才能够团结一致地与其他个人、群体和社会相处，同时与其它物种、与地球和谐相处。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从资本手中夺回对国家的控制。公共权力——国家——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和独特的，对它的控制应该在劳动人民的手中。虽然资本可能统治着相当数量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通过服务大众利益的计划逐步使所有的生产服从于社会目的，具体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将是根据具体的形势而做出的务实决定。

每个国家，由于其生产发展、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历史形态不同，都将按照自己的步伐和模式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有些可能会迟到，有些可能会绕道而行，有些，可能是少数，可能不会很快加入。

“人民和地球高于利润”的原则压倒一切，这意味着人民及其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有着如下主要要求：

1、在疫情期间，身体、经济和情感上的痛苦使得医疗完全社会化和普遍免费成为打开社会主义大门的杠杆。它必须包括基于社区的公共卫生系统，扩大到最偏远的地区和村庄，能够为目前和未来的大流行病提供最好的预防和治疗方案。这样的医疗保健系统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都是可能的，并且还有两个优势。它对熟练医生的需求将扩大公共教育、培训和防治研究，为许多人提供高质量的工作。它需要一个积极致力于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机构，这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客观必要条件。如果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系统是可行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实质上，人们将清楚地看到、要求并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将其模式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如教育、儿童和老年人护理或住房。

2、为了描绘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所一再阐明的内容：生产的两大要素，土地和劳动，不是商品，二者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工具，即货币，也不是商品。资本主义将它们视为商品，使自己陷入了矛盾之中——私人占有社会劳动成果、环境遭到破坏、农业和初级商品生产者处于不稳定状态，管理不善的货币、金融危机。

土地、劳动和货币的去商品化将是向社会主义的重大前进。

解决生态紧急状况的紧迫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必须将土地和水体纳入公有制，制定一个可行的、可操作的计划，以防止生态灾难。这样的计划应该以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为基础，必然包括放弃化石燃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资和部署可再生能源和零碳公共交通，恢复生物多样性，植树造林，以及重组粮食系统。它还将促进合理公平地提供住房和为各种经济目的分配土地。

普遍的工作机会及其对一切能够工作的人的奖励，加上对无法工作者的支助，以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有人的工作时间的减少，为自主和创造性追求打开了大门，能够将个人成就、科学和文化推向以前无法想象的高度。

我们必须将货币和银行国有化，将其转变为社会组织化的生产和分配工具。近年来，除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之外，帝国主义国家还试图通过知识产权将知识和技术商品化。与自然一样，文化、知识和技术是人类共同财产，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我们也必须扭转其商品化趋势，使教育和研究公开化，使知识自由流动。

3、社会主义的更大进步在于如下合理的原则：即对资源开采、交通运输、数字平台（私有制会阻止其充分造福社会的潜力）等的垄断，以及生活必需品——食品、住房、教育或医疗的生产，必须进行严格管制或国有化，它们的私有制不利于社会。

在阶级斗争、国际斗争、公共供给和公有制已经相当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的进程将更加顺利。当然，我们必须消除它们现有的局限性——阶级、父权制和种族方面的偏见——并使他们民主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

4、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富裕的国家，也必须通过辩论和讨论，把真正的需求和资本主义市场所刺激产生的“需求”相区分，后者通过消费主义者的幻想和计划报废而产生，没有满足，只有永久的不满足和贪婪，更不用说环境破坏。一个关键的结论是停止一切浪费性的活动——例如，（超出基本防御的）武器生产或金融投机。

在正确的国际环境中，这些目标将更容易为各国社会所追求。

5、我们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新冷战，建立雄心勃勃的多边国际治理机制，促进各国在经济、性别、种族、宗教等方面实现平等，通过经济、政治、金融、科学、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互利共赢。第三世界的真正发展需要对人的能力进行投资，需要一场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来满足人类和地球的需要，需要各经济体进行一体化合作以加强工业、数据和人力资源链，需要可持续的连通性和绿色基础设施来广泛分配收益。

6、我们还必须挑战帝国主义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来表明其统治地位的虚假和伪善的普世主义。我们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取而代之，以应对共同的挑战：不安全、不信任、不尊重、战争、不公平的发展、各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威胁到生态健康的、对维持人类生命的土地、土壤、水、海洋和空气的严重破坏、卫生基础设施不足、灾害管理无效以及不可持续的债务机制。国际治理需要反映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宪章最初的理想以及和平共处倡导的不结盟运动原则是进一步构建替代美国和西方统治机制的良好基础。

我们的世界及其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巨大的资源，只有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才能维持这种多样性。虽然和平、发展、平等、正义、民主和自由

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但并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相反，世界必须不断交流，相互学习，分享进步的成效。

全世界劳动者、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团结起来！